

# 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述评

付建斌 焦书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 要** 对应偏差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现象在其他文化中也普遍存在引起广泛关注。该文综述了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仍十分薄弱,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性观点。对将来研究提出三点建议:1. 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 2. 直接测量隐含理论; 3. 注重交叉研究。

**关键词** 对应偏差, 跨文化研究, 评述, 研究建议。

对应偏差 (correspondent bias), 亦称为过分归因偏差 (overattribution)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指的是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 夸大内在因素, 低估外在环境因素, 甚至在行为是由明显的外在环境因素造成的情况下。对应偏差在西方研究了 30 余年, 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最活跃, 被重复证实的现象<sup>[1]</sup>, 甚至有人以为对应偏差不只是一种一般的奇特心理现象, 而更重要地是西方社会心理的核心<sup>[2]</sup>。那么对于这一西方重要的心理现象在其他文化中的表现, 这个问题就引起了许多心理学家的兴趣。

## 1 对应偏差与隐含理论

在对应偏差产生的心理机制研究中, 西方学者十分强调隐含理论 (implicit theory) 在对应偏差产生中的作用。所谓隐含理论指的是指导人们理解行为, 包括对行为解释和将来行为预测的那些一般理论以及许多具体理论, 这些理论的

有次序地储存在一个“记忆箱”(memory bin)的不同层里,那些经常或最结构存放在记忆箱的上层,当要加工新信息时,人们就从记忆箱中自上而下以在上层的认知结构最先被提取<sup>[6]</sup>。由于隐含理论能在广泛的层次上对知识和经验进行比较,因此在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中,心理学家常用隐含理论对归因的影响。最常被引证的一般隐含理论是:人格特质主义(dispositionism)亦称为实体理论(entity theory),即认为行为主要是由于行为者的人格决定的,他们是持久不变的,他们完全依赖特质(disposition)信息对行为和结果进行判断和评价;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t theory),亦称为增强理论(incremental theory),即认为行为是当时情境所决定的,人的特质是变化的,他们对行为及其结果所作的判断是变化的,具有时效性<sup>[3,7-9]</sup>。Dweck, et al 认为隐含理论对人们的行为并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给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构架(framework),促使人们的反应与该构架一致。持不同隐含理论的人对输入社会信息的编码和组织方式不同。特质理论者是以明显的评价性标签(evaluative tags)来编码信息,以与特质相联系(trait-relevant evaluative meaning)来分类信息,而增强理论者较少对输入信息进行分类,他们是以一些中介信息,比如人们的行为目标,来分类信息的<sup>[8,9]</sup>。

## 2 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

当前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研究最多的是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心理和行为<sup>[10]</sup>。在欧美文化中,人格特质主义在其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在西方,个人被认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每个人都有一整套内在的个人特质,比如能力、人格特征和态度。这些内在的个人特质是不依赖环境而存在的,即不论在何种环境中,个人特质都能得到稳定的反映。由于个人的这些特质,个体被看作是自治的、独特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人的差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倾向于情境主义者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连接以及社会关系、社会角色、准则、群体一致比自我表现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个人更重视他人的期望,以群体利益为重。个人的实现来自于对社会关系的和谐参与。个人是自我中心、个性强烈的人是不成熟的、没有教养的,一个人应善于感知他人并适应环境,个人应适应环境的社会要求,善于以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国小孩的差异大得多<sup>[13]</sup>。杨国枢、彭平根认为中国人有个传统，即把人于缘份（即一种命中注定或先前决定的人际关系，或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的契合状态）。在中国社会中，用缘份这种外在原因来解释人际关系的自我保护，保护他人，维护人际关系和谐，最终达到群体稳定的作用<sup>[14, 15]</sup>。学的学生为被试，发现他们在对学生成功归因时，除了有杨国枢所提出取向的归因模式外，另有以“运气”和“命”为主的机遇式归因<sup>[16]</sup>。Morri案件”和同一时期发生的与之相似的“邮差案件”为素材，考察了中、美对两个案件归因的差异，以及中、美被试对两案的归因差异，结果表明还是美国人，中国人都倾向于环境归因，而美国人都倾向于内在归因。分别考察了中、美人在物理性因果关系视知觉和社会性因果关系视知觉理性因果关系视知觉中，他们用计算机制作了两物体的一组相撞 (collision) (acceleration) 的录像作为刺激材料，结果显示中、美被试在物体运动的差异。在社会性因果关系视知觉中，他们用计算机制作了一组鱼的不激材料，结果显示中国被试更多用外因来解释鱼的运动，而美国被试更 Morris & Peng 用隐含理论解释了结果，他们认为中、美文化不同，中、含理论亦有不同，但这种隐含理论是有关社会性事件的，因此中、美被上有差异，而在物理事件归因上没有差异<sup>[7]</sup>。Lee, Hallahan & Herzog 释运动结果时香港记者多用环境因素，而美国记者多用内在特质因素<sup>[11]</sup>认为在因果性视知觉上，中国人更注意图形的周围环境，而不是图形本相反。Masuda & Kitayama 在实验中应用了 Jones & Harris 的“态度归实验考察了日本被试，结果显示在经典的“态度归因范式”实验上，日本应偏差，但在“态度归因范式”的变式实验中，即突出情境因素时，日本差。Choi & Nisbett 在应用经典的“态度归因范式”及其变式实验考察被试时发现，美国被试在每一个实验中都表现出了对应偏差，而韩国人变式实验中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对应偏差。Krull et al 发现中国被试在式”的实验中，亦表现出了对应偏差。总之，西方学者以为，以西方对应究东亚人时，并未证明东亚人具有对应偏差，以及归因时忽视环境因素人表现出了对应偏差，他们的这种偏差较之欧美人也易于校正得多<sup>[10]</sup>。

实验的第二部分,把由印度锡都人被试描述的锡都人行为材料呈现给美国锡都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结果发现美国人的归因比锡都人的归因更强调行为本身,但这个实验存在两个问题:(1)对美国人呈现的是二手材料,这可能导致行为的实际原因仍未确定。在 Morris & Peng, Lee, Hallahan & Herzog 的实验中呈现给中、美被试的都是同一刺激,但事件的原因仍是模糊的,说明在对模糊事件归因时,美国人具有内在归因倾向,而东亚人具有外在归因倾向,但他们并不能说明一种文化下的归因倾向就是对应偏差的反映,而另一种文化下的归因倾向就是对应偏差。而真正直接对对应偏差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只有 Masuda & Nisbett, Krull et al,这些研究全是利用“态度归因范式”进行研究。虽然跨文化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利用“态度归因范式”及其变式进行的,但仍有许多研究对“态度归因范式”本身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态度归因范式”只是一种在实验室中人为制造的行为的限制条件,即对写作条件的随机安排,在日常生活和特殊的行为限制条件,被试对此并不熟悉,而他们更熟悉的是其他的一些行为限制条件,如压力、金钱刺激、情感压力、激惹、愚昧等等<sup>[18]</sup>。因此,所谓西方人易犯对应偏差的结论,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是否这样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sup>[19]</sup>。实验表明日常生活中,对应偏差并不是普遍现象<sup>[20]</sup>。另外, Masuda & Nisbett et al 的研究都只有一种文化下的被试,因此严格来说,它们并不属于跨文化研究,得到的研究都是属于跨文化心理学中的客位 (etic) 研究,即指站在研究者本国的文化背景,运用一种文化标准和概念来分析另一种文化背景的心理问题<sup>[21]</sup>。而史永超的研究则属于主位 (emic) 研究,即指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概念和行为解释,运用地方性标准和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概念来分析本土文化的心理问题<sup>[21]</sup>,他们的结论也仅仅说明中国人具有外在归因倾向。

2.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讲究研究样本的可比性、机能的等值性、概念的等值性<sup>[21]</sup>。而在这些方面,以上的一些研究亦存在问题。Morris & Peng 的研究以台湾、香港和大陆留美学生作为中国人群的代表是不适当的,且用以编码的词汇来自美国本土的中文报刊亦缺乏代表性。

3.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应偏差的跨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得出什么结论性的观点。许多论点也仅是推论性的,并无严格的实验支持。因此,跨文化研究对东亚文化下的归因倾向作出非推论性的结论,这应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粗略地考察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下人的心理不精确。因为在同一文化中,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亦十分大,而这些差异现象的影响并不亚于大文化的差异<sup>[23,24]</sup>。比如,相对日本人的团体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化。日本人的团体意识十分强烈,行为准则都是以对方成员为依据,把自己埋没于“我团体”中,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以“我团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而中国人的个人与社会界限模糊不清,方和自己的关系为依据,这种关系是以个人需要为基础的,且根据个人变化,其目的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个人利益<sup>[25,26]</sup>。杨中芳也认为中国人内控,但控制来源不等同于控制动机,中国人可以认识到控制来源,强的控制动机<sup>[27]</sup>。这种强调自我的行动性和自主性也许会对中国人产生影响,以表现出与日本人不同的特点来。因此研究亚文化之间对应偏差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Leyens J P, Yzerbyt V, Corneille O. The role of applicability in the emergence o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2): 219—229
- 2 Ross L.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In: Berkowitz L ed. *A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77. 173—220
- 3 Nisbett R E, Ross L.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NJ: Prentice Hall, 1980. 30—32
- 4 刘永芳. White的“原因加工理论”述评. *社会心理研究*, 1996, 25: 46—51
- 5 Hilton D J, Slugoski B. Knowledge-based causal attribution: The abnorm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6, 93: 75—88
- 6 Graham S, Hudley C. Attributions of aggressive and nonaggressive African-American... A study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3): 365—373
- 7 Morris M W, Peng K.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6): 949—971
- 8 Dweck C S, Hong Y, Chiu C. Implicit theori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3, 19: 644—656
- 9 Dweck C S, Chiu C, Hong Y. 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ir role in judgments and... two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5, 6(4): 267—285

- 15 彭平根. 中国人的缘份之社会心理分析. 社会心理研究, 1996, 28: 55—59
- 16 史永超. 大学生学业成败归因特点的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 1992, 12: 15—24
- 17 Lee F, Hallahan M, Herzog T. Explaining real life events: How culture and d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 732—741
- 18 Alicke M D, Zerbst J I, Loschiavo F M. Personal attitudes, constraint magnitude, a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18(2): 211—228
- 19 Gilbert D T, Malone P S.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Psychology Bulletin, 1995, 117(1):
- 20 Lewis P T. A naturalistic test of two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Correspondence bias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5, 63(1): 87—111
- 21 李秋洪.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文化偏见 社会心理研究, 1994, 17: 43—46
- 22 Bond H M, Smith P B. Cross-cultural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nu  
1996, 47: 205—235
- 23 Si G Y, Rethorst S, Willimczik K. Causal attribution perception in sports achieve  
study on attributional concept in Germany and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  
537—552
- 24 张兴贵. 成就动机的跨文化研究述评. 社会心理研究, 1995, 21: 44—49
- 25 吴鹏森. 差序和隶属: 中国社会的潜结构. 社会心理研究, 1995, 23: 1—8
- 2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26
- 27 杨中芳. 试论中国人的“自己”: 理论与研究方向. 见: 杨中芳, 高尚仁主编. 中国人·中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93—145

## REVIEW ON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CORRESPONDENT BIAS

Fu Jianbin      Jiao Shul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100012)

### Abstract

© Correspondent bias is one important topic in western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henomenon also existed in other cultures is of general con-